

72318-23248123.html。

(18) 相关信息参见“大众点评网”。

(19) Andrea Mubi Brighenti, *Visibility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39.

(20) Andrea Mubi Brighenti, *Visibility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44.

(21) 李文儒:《中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的反思》,载宋向光、朱雅娟主编:《策展·博物馆陈列构建的多元维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序第3页。

(22) 李文儒:《中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的反思》,序第4页。

(23) 《南京博物院趣味“萌”文物成看点》,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4/01-07/287722.shtml>。

(24) 《博物馆联盟》,中国国家博物馆网 <http://cms.chn-museum.cn/portals/0/web/zt/bwglm/>。

(25) 《视频 北京 故宫晒“穿越照”与历史人物同“游”紫禁城[东方新闻]》,《紫禁城》官方微博 2014年11月22日。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李明彦)

城市景观的视觉性建构

童强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大促进城市的高速发展,城市景观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林立的高楼、宽阔的广场、繁华的商业中心、优美的城市公园,包括日益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地铁、高架、隧道等,不仅满足了城市生活的各种功能需要,而且也带来新的景观。本文以上海陆家嘴景观为例,着重讨论城市景观的视觉性建构。这里的“视觉性”并非指纯粹物理意义上事物的可见性、可视性,而是在社会领域中“如何看”和“如何被看”的社会机制,这是复杂的建构过程。

视觉的社会建构包括了视觉的社会建构与社会的视觉建构两个方面。米歇尔认为:“视觉文化的辩证概念不能只停留在把研究对象界定为视觉

领域之社会建构的某种定义上,而是必须强调去探究这一命题的另一形式,那就是社会领域的视觉建构。这不仅是说由于我们是社会动物,所以我们会看见自己的作为方式;而且表明由于我们是会看的动物,所以我们的社会筹划才呈现出付诸实施的形式。”⁽¹⁾社会领域有一个视觉建构问题,而视觉领域有一个社会建构问题,这两个领域既有所区别,也紧密联系。

横跨社会领域与视觉领域的关键性概念是“视觉性”。按照福斯特(Hal Foster)的说法,它是指“如何看”和“如何被看”的社会规训。⁽²⁾当然这一规训通常不是以说教或强制的形式,而是通过快感化的、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形象感知过程实现的。这正是景观在今天尤其重要的原因。景观已经成为现代规范以及引导的重要途径,通过城市形象、视觉表意实践可以塑造主体的视觉行为及其范式,激发普遍的社会认同。现代城市煞费苦心地向我们展现梦幻般的景象,引起持续不断的关注,吸引大规模的注意,大到壮观的上海浦东景观,小到令人爱不释手的巧克力包装,都是想通过视觉的感知、城市景观印象的集合,使我们获得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评价、认知、判断以及情感依赖等。我们已经进入视觉时代。

视觉性,意味着在社会领域中如何按照某种(社会文化的)指引来看,这其中对视觉对象的阐释、建立相应的话语体系是非常关键的环节。这是社会的视觉建构过程。在人们对于“现代化”是什么几乎完全不了解时,一张纽约哈德逊河上所看到的曼哈顿高楼林立的照片就几乎使人“完全理解”了。城市景观奇妙地传达着某种生动的内容,尽管这些内容确切是什么,人们茫然无知,但形象具有超越语言文本的感召力。诸如纽约、东京、中国香港等高楼林立的景观都在相当程度上“启发”了中国各大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思路,许多城市都依赖地标性建筑,大规模摩天大楼的建筑群来集中展示现代化。这当然与中国近代以来有关现代化特有的语境有关。形象与文本交互作用实现了某种阐释。形象的阐释是本文讨论的第一个重点。

视觉性,还意味着在视觉领域中城市景观是如何(按照视觉特性、视觉美学)设置被看的,这是视觉的社会建构过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拿什

么给公众看,二是让公众如何看,在哪里看。第一个方面即国家意志、民族愿望、民众想象以及各种社会过程的视觉化、形象化。在诸多城市景观表征系统中,上海陆家嘴景观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例子。上海浦东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缩影。而这个“缩影”此时已不再是比喻修辞上的一个词,而直接就是浦东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直观的表征形式——陆家嘴景观。数百米的超高建筑何以能够成为现代化成就的表征,这在文本领域中很难解释,但在视觉中按照形象逻辑却几乎是不需要解释的现象。第二个方面即视点。城市景观的概念不仅指景观形象本身,即特定建筑、建筑群的形态、布局、风格等,还包含特定视点的假设、设置,尽管这一假设往往被忽略了,但正如文本总是暗含着对读者的想象,景观也总是希望公众从特定的(规定的)视点观看。视觉建构必须考虑景观如何向公众呈现,通过何种视觉上的、视点上的设计引导公众观看,这是本文讨论的第二个重点。

一

陆家嘴本是黄浦江边的一块冲积沙滩。黄浦江自南向北流过上海,在与吴淞江汇合后,折向东流,在东岸形成了一块鱼嘴状冲积沙滩,因明代翰林学士陆深居于此,故称陆家嘴。明末清初,渔民散居,后江苏等地船民多来此定居,逐渐形成一些自然村落。清同治元年(1862)后,英、美、法、日、德等国先后在此辟建仓库、码头、堆栈、工厂,民族工商业也兴办造纸、火柴、船舶修造等企业。随着商业繁荣,烂泥渡路形成商业街。抗战期间,商业渐由烂泥渡路和陆家嘴路移至东昌路。新中国成立后,东昌路成为浦东地区最繁荣的商业街。

1990年4月以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始规划开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上海主要金融中心区之一。从景观方面来说,这里包括了东方明珠(468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92米)、金茂大厦(403米)以及正在建设的上海中心大厦(632米)在内的超高建筑100多座,陆家嘴建筑群由此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新景观。

城市景观的建构涉及诸多方面,但首先必须

具备鲜明的可见性、可展示性。在这一点上,陆家嘴景观充分具备这样的特点,规模超大的建筑群,风格各异、林立高耸,强烈地吸引人们视觉注意力。人们对浦东的了解,甚至不必亲身到开发区众多的金融机构或外高桥港区去体验,也不必留意2011年浦东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400亿,并有望在2016年突破1万亿这些数据,而是通过陆家嘴这样一个鲜明可见的直观形象。在视觉文化中,“对象领域是由那些我们能够看到或其存在受到可见性激发的事物构成的。这些事物具有一种特殊的视觉性(Visuality)或视觉品质(Visual quality),是这种视觉性或视觉品质传达了社会构成物与这些事物的互动”。⁽³⁾这种可视性,使得浦东比其他地方更具有视觉性,它的景观远比这一区域的经济数据、经济运作、社会生活的内容更吸引人,更具说服力。视觉形象本身传达了足够丰富的蕴含。也就是说,对于陆家嘴之外的人而言,陆家嘴更多的是一个景观的存在。“当一个社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生产和消费形象时,当形象对经济健康、政治稳定和个人幸福的追求变得不可或缺时,这个社会就进入了‘现代’,这时,形象拥有非凡的力量,能决定我们对真实的要求,而且形象本身成为令人向往的直接经验的替代品”。⁽⁴⁾

城市作为一个物质集合体,本身就具有纯粹物理意义上的可视性、可见性,但并非所有可见的事物都被我们“看到”了。对象的“可见性”很容易在作为日常生活的功能性实践中被忽略,而且也不可能不被忽略。在上下班高峰时乘坐地铁,人们大多不去理会地铁作为景观的意味,也不会注意到它作为一种高科技产品、现代化城市交通工具所具有的意义。当然,这些事物的可见性在我们日常的功能性活动当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对一个城市的感情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我们长年生活其中所熟悉的环境形成的,城市的日常景观构成了我们生活环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作为“宏大景观”,陆家嘴与城市的公园、街景等日常景观不同,其建筑群本身的形态赋予了景观鲜明的视觉性。建筑群高度惊人,形态独特,而且规模巨大,客观上就吸引了公众的目光。事实上,超高的建筑本身就是雄厚的财力、先进的技术、完善的组织管理的成就。

显然,视觉性并非仅仅指物理上的可见性。建

筑尽管直接地具有可见性,但并非所有的建筑、客观对象都能够成功实现深度视觉性的建构,它必须具有形象方面的某些特征,同时又能够纳入某种话语领域当中。这包括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其中最重要环节正是通过阐释使形象成为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话语领域中的看才使形象真正可见,形象由此开始视觉性建构的漫长旅行。建筑奇异的外观、使人惊悚的高度都是把景观引入话语领域的基础,当然,即使它令人震惊,仍然需要形象的解释。

十七世纪荷兰具有发达的视觉文化,不仅在于这一时期他们有着伟大的风景画作品,而且也在于他们建立了一套分辨性的术语,能够向普遍民众解释其所共享的视觉表征。^[5]面对纽约城市景观,我们很自然就将其纳入到我们的解释体系中,我们看到的,至少首先看到的是“现代化”。当然美国人也会给予解释,美国人看到的则是“过度性、多样性、奢侈、不可预知性、不确定性、神秘性或模糊性”。^[6]这一区别正说明:一是对于特异的视觉形象,或者说奇观,人们会给予解释。二是阐释就是“视觉性或视觉品质传达了社会构成物”的过程,即视觉形象能够传达特定的意味与蕴含,而这些意味与蕴含又是历史性社会建构的结果。不同的语境造就了不同的形象建构。

陆家嘴景观并不缺乏阐释,它的形象与其阐释文本之间有着密集的互动关系。面对黄浦江对岸的景观,一方面它对观看者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力,另一方面,围绕景观形成了多重阐释文本。这些文本都在为景观的视觉性提供有力的、彼此关联的观念支持,包括国家政策意图、经济成就、旅游宣传等一系列阐释。

国家政策的决定、政府的主导规划使陆家嘴景观获得非同一般的重大意义。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定,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部署,制定“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开发方针。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的战略蓝图,此后浦东发展异常迅速。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委、市政府明确浦东

“一个作用(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三个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区、自主创新示范引领区、现代服务业核心集聚区)”,这标志浦东发展进入新的阶段。^[7]2012年1月,国家发改委公布《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进一步明确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任务和方向。不难看到,陆家嘴景观的背后有着一整套国家发展战略的叙事。

国家高度重视,促使浦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从1990年到2002年,浦东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上海市经济总量,从8%上升到的23%。2012年,浦东新区GDP为5929.91亿元,占上海市生产总值20101.33亿元的29.5%。^[8]经过20多年的发展,陆家嘴金融机构云集,国内几家银行都在此建立了第二总部,外资银行的中国总部也多落户于此。整个景观成为中国金融业的象征,社会发达和现代化的标志,由此形成特定的景观效应,带动更大的集聚发展。媒体声称,陆家嘴正在强化自身与华尔街、伦敦金融城一样的金融符号意义。又称:“尤其是这里的夜景,相比欧美高度发达国家的城市毫不逊色,电影《007》就有所体现。这里林立……大厦,另外还有尚在建设中的上海中心大厦(632米),更使陆家嘴的写字楼驰名中外,能在这里办公是企业实力和地位的象征。”^[9]

从国家政策,到广告宣传,从图片影视,到新闻报道,构成了围绕浦东新区景观的多重阐释性文本。景观与阐释性文本之间形成互动并不断强化。文本明确了景观的宏伟意义,并得到民众广泛的了解,而景观则以直观的形象印证了文本的真实性,真实的文本反过来又使景观所表征的蕴含成为真实。视觉性的形成有赖于这种形象与阐释之间持续有效的互动。可以说,有关陆家嘴景观的叙事、阐释性文本,扩大并强化了它在媒体和民众心目中的深刻印象,

这是观念加诸形象的过程。形象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按照本雅明的解释,外部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形象(现象)并不是以它们天然的经验状态,未掺表象地进入观念领域,而是以某种“基本元素的形式”进入。观念是形象(现象)的虚拟安排,又是对形象的客观解释。“观念之于物体就仿佛星座之于星星,……观念是永恒的星座,而根据这些星座中作为点而可见的元素,现象进一

步分化,同时又得以恢复”。⁽¹⁰⁾

形象并不包含在观念之中,但观念却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涵盖形象。常人的目光永远也不可能从几颗闪亮的星星分布中推导出猎户座;只有敏锐的目光,经历“双重媒介”,即哲学沉思、观念转换为语言从现实的内核中释放出来的过程,才有可能看出其内在的秘密。

无论如何,解释文本都不是内在于景观之中的,而星座则是“将感知物转换为观念的一种安排”,虚拟的安排,但却是客观的解释,因为星座并没有改变星星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632米高的建筑无论如何都是先进建筑技术与管理的客观过程。尽管本雅明解释了观念之于事物就像星座之于星星,但猎户座是如何产生的、观念何以能够附丽在景观之中,这一过程仍然神秘。不过具体到城市景观,我们多少还是能够在历史文化的语境中找到端由。

近代以来,在与西方的较量中,我国所处的劣势以及由此遭受的巨大痛苦,使得广大民众都期待着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期待着“现代化”。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很难清晰界定。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现代化,或者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期望的现代化。但民族的期待会造就清晰的“现代化”目标。这一目标既是观念表达,又是形象呈现,或者说,既不是观念,又不是形象,毋宁是观念与形象的统一体,一种理想的符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表述的是“凡理皆寓于物”。物、形象在此经历了一种简化的过程,而观念就是伊格尔顿所说的“一种要被破译的密码或画谜,一种被极度简化的社会过程的形象”。⁽¹¹⁾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叙事或者说“现代化”目标,促成了特殊话语体系的形成。作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目标,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各个领域。从我们对西方世界的想象,到政治上对国富民强、独立自主的向往;从知识界对先进科技的描述,到民众对富裕的物质生活的期望,都促成了“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形成,而这一话语体系始终包括形象性。在表述中国城市近代化、现代化进程时,我们习惯上都是用天津、上海、汉口、青岛等建有洋房的街区作为图景。⁽¹²⁾

实际上,城市建设包括了高度综合性的内容,

既有硬件的建设,也有科教文卫软件方面的更新完善;既有城市经济的内容,也有文化建设、软实力提升等多方面的任务,因此西方式的建筑、超高的大楼、繁华的商业区,甚至是先进的工业景观,能否承载现代化的核心蕴含,在文本逻辑下是很难给予解释的。但对于一个城市的认同、一个时代的认同而言,城市诸多发展内容却需要有一个简练、浓缩、可见的象征与表达。在图像逻辑中,城市大型的、风格独特的标志性建筑、建筑群无疑就直接给予了公众发达城市的直观印象。陆家嘴景观的视觉性与文本性的互动,使得这一景观呈现出生动的星座图景,一个现代化、发达、先进性的象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陆家嘴景观不仅塑造了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并且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

陆家嘴景观固然需要一个现代化阐释,但中国的“现代化”观念或目标无疑更需要这一景观。本雅明的话很有启发:“理念(观念)最好应解释为语境的表征,在这种语境中,独特的和极端的东西与其对等物携手并肩。……经验的东西越是被清楚地视为极端,就越能得到深刻的理解。概念植根于极端之中。正如母亲只有当孩子们紧紧围在身旁而产生亲近感之时,才开始生活在真正充实的权力中一样,理念也只有当各个极端都聚集在周围之时才具有生命。”⁽¹³⁾现代化语境可以将超高建筑与现代化并置在一起,而此时最复杂的现代化理论都可以通过那632米高的建筑得到充分的说明。景观不仅是形象,也是观念的表征。

二

浦东陆家嘴建筑群有一个非常理想的观看地点——外滩。外滩作为陆家嘴景观的“视点”,其形成确立经历了一系列的建构过程,特别是视觉制度化的建构。

陆家嘴一带特殊的地理形势为其景观的呈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陆家嘴在黄浦江东岸边呈现突出弧线状,正对浦西的外滩。由于黄浦江的宽度拉开了观看距离,在近两公里的外滩上,绝大部分地段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陆家嘴建筑群的全貌。外滩的地理位置,为中国现代化的典型景观——陆家嘴建筑群提供了一种既庄严崇高,又

轻松浪漫的全景观方式。没有外滩,陆家嘴景观不会如此壮观。

不同城市景观的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南京作为一个重要的省会城市,在展现当代中国现代性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景观基础,其中心商业区从新街口到鼓楼一带3公里范围内也集中了一定数量的高楼,其中包括能够进入全球排名的紫峰大厦(450米)。但其中心景观的呈现方式,却是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除了某些高楼、高架桥等特定位置之外,人们很难在一定距离之外找到一个恰当的视点,纵观南京中心区域最繁华的景观。

恰当的视点应该与景观保持一定距离。黄浦江流经上海市区的江面平均宽度约为360米,在陆家嘴一带400米左右,外滩与东方明珠的距离为800多米,在这个距离尺度上,观看陆家嘴建筑群非常适宜,但南京城区中心景观却很难找到类似的绝佳视点。在城区东北方向的玄武湖固然可以观赏中心城区的建筑景观,虽然湖面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相距过远,最近的湖中小岛距离鼓楼紫峰大厦也有1.5公里,距离新街口中心区超过3公里,几乎看不到新街口一带的建筑,更不利的是绵延的城墙遮挡部分的景观。景观的生产包括了视点的定位、观看方式的确立、进入观看场所的引导等重要环节。相比陆家嘴景观,南京中央商业区的景观,不仅在规模、体量上不及,而且因地理条件方面的局限,它也无法提供除了街景之外整体性的观看视点。

陆家嘴景观的制度化建构,最具特色,也最为成功是它的“视点”的确立。视点,就是人们观看景观时的立足点;立足点会不同程度影响到我们所观看的景观。不同的视点,会获得不同的景观印象。因此,视点的设置是景观的视觉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说,现实的、辩证的景观概念中必然同时包含着属于自己的视点,就像一场演讲,演讲者总是意识到应当针对他的听众。景观总是向着特定的视点生成。它也许只向着一个视点开放,也许是向着无数个视点敞开。不同的视点将会形成一个序列,还是处于同等地位?有一个视点因为它与景观之间的无法取代的关系而具有垄断地位?还是景观自身具有某种开放特性,能够取消视点,让所有的视点都具有相同的合法性?所有这些考虑,事实上都包含在视点的设置中。视点总是内

在于景观之中,除非景观忘掉这一点。

目前的城市景观设计中,往往忽略了景观本身所包含的“视点”。人们忙于把高楼建造起来,却没有充分考虑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观看这些高楼。当然有时,只要能看到,从哪里观看并不重要,但视点设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能看到。针对自身的公开性,景观是在以自己的方式邀请观者以特定的方式、视点观看。正是在这里,景观的生产也意味着视点的生产、看的方式的规定。景观由此包含着霸权的成分,视觉性是赋予视觉对象仿佛能够客观言说的权力。^[14]

外滩原本只是防汛设施。从1921年发现上海地面沉降之后,潮水漫入市区时有发生,但当时的市政对此无能为力。新中国成立早期,几次大的外滩工程主要目标都是防汛,防汛墙不断增高。^[15]此时的外滩是休闲游览的区域,可以欣赏西洋老建筑,江上风景,至于对岸陆家嘴一带则是普通城镇景象,毫无特色可言。

1990年,国家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在陆家嘴建立全国首个国家级金融开发区。而就在这前后,1989—1993年期间,地方政府再次修建外滩防汛墙。从黄浦公园至新开河约1700米的江边,采用双层空箱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构筑防汛墙,新设施保留了最基本的防汛功能,但同时增加了观光休闲设施。防汛墙体顶层平台的地面由彩色地砖和花岗石铺成,增设了32个半圆形临江观景平台以及其他绿化休闲设施,增大了观光活动的空间。这一重要的改造正切合着初具规模的陆家嘴景观的出现。到2007至2010年,陆家嘴景观已经相当成熟,政府再一次实施外滩综合改造工程,增强游览区的吸引力,优化对陆家嘴景观的观看条件,扩大游览区,滨水区域延长至2600米,新建四个广场,地面观光活动空间新增约40%,绿化面积达到约2.33万平方米,增加了可以容纳2000人就座的座椅等。^[16]滨水观光平台不仅为公共提供了休闲娱乐场所,同时还为“陆家嘴景观”的观看提供了一个标准视点。

“视点”的确立是视觉过程的制度化。首先必须发现风景,或者说找到景观最有说服力的观察点。这虽然只是个体视觉审美选择的结果,但如果通过体制建构,在原观点上大批量重复这一过程,那么个体的视觉过程就转换成了一种制度。这一

观看内容以及观看方式,由此形成规范或标准,进而得到传播。其次,景观须具有公开性、公共性,正如本雅明所说,建筑始终是集体观看的客体,^[17]只有群体观看的景观才真正具有景观的意义。徐霞客独自游历山水时,所看到的黄山风景,严格说来,还没有景观化。如果能称之为“景观化”,那也是读者通过视觉化阅读他的游记文字在心目中激起充分的想象实现的。他所发现的风光必须经过“开发”,修建道路、开设旅店、保障饮食、景点宣传等一系列制度化的建构过程,视觉审美及其观看模式通过复杂的社会手段得到再生产,一种集中可控的、大规模批量再生产。个体观看景观的视觉过程由此得以制度化,转变成为可以预先设计的公众观看。观看催生了景观,景观与视点,是一个视觉事件的两个方面。在彼此交互作用中,景观与视点同时确立起来了。站在上海浦西的外滩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整个浦东的高楼林立的繁华景观,但在这一现代性景观没有出现之前,相对应的视点也不存在。

在这个标准的视点上,陆家嘴景观呈现出它的典型形象。在此拍摄的照片与影像,即景观的二次呈现,不仅再次认同了景观,也再次确认了这一视点和观看的方式。在这里,这样看,才能看到最美的景观。如此观看,成了一种范式。观看的范式、标准的视点就像传统时代的习俗一样,形成了潜移默化的规范力量。

对于日常景观而言,它们大多不具备制度化的社会建构的视点,也缺乏社会文化、知识系统的阐释力量,视点更灵活多样,带有个性化色彩。但对于陆家嘴景观而言,其他视角的选择以及观看方式无疑是与特定的范式展开了对话,也提出了某种挑战。网络以及数码产品的普及,景观的再现以及观看方式、观看视点,形成了更多的可能性。未来城市景观也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视觉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2JZD01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W. J. T. Mitchell, *What do Pictures Wa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345.

(2) Hal Foster, ed., *Vision and Visuality*, Seattle: Bay Press, 1988, p.ix.

(3) (14) 米克·巴尔:《视觉本质主义与视觉文化的对象》,周宪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5页,第164页。

(4) 苏珊·桑塔格:《形象世界》,载陈永国编《视觉文化研究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5) 参[英]鲍尔德温(Elaine Baldwin)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74页。

(6) 道格拉斯·塔拉克:《纽约,纽约》,载陈永国编《视觉文化研究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9页。

(7) 参马学强等:《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智慧与理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11页。

(8)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局 <http://www.stats-sh.gov.cn/sjfb/201302/253153.html>。

(9) 参百度百科“陆家嘴”条 <http://baike.baidu.com>。

(10) 卡伦·雅各布:《暴力的景观,艺术的舞台:瓦尔特·本雅明与弗吉尼亚·沃尔夫的辩证法》,载陈永国编《视觉文化研究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页。参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7页。

(11) 卡伦·雅各布:《暴力的景观,艺术的舞台:瓦尔特·本雅明与弗吉尼亚·沃尔夫的辩证法》,载陈永国编《视觉文化研究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12) 马学强等:《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智慧与理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79-89页。

(13) 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陈永国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5) 1959年,外滩开始修建砖土结构的防汛墙,墙顶高度4.8米。1963年,上海限制地下水开采,控制地面沉降,同时在市区全面修建防汛墙,而外滩是钢筋混凝土L型防汛墙,标高5.2米。1974年8月,台风侵袭使不少地段高潮位和防汛墙齐平。同年11月,上海市防汛指挥部颁布了新的防洪标准,外滩标高确定为5.8米。

(16) 参见2010-3-24《人民日报》。

(17) 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品》,陈永国编《视觉文化研究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李明彦)